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 “唐诗王国的异乡人”

□ 荆晓燕

宇文所安本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韩愈与孟郊的诗》。毕业后，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和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先后出版《初唐诗》《盛唐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等专著十余部，并与孙康宜共同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领域著作等身、声名赫赫，是美国汉学界的翘楚和领军人物。2018年，宇文所安获得第三届唐汉学奖，可谓实至名归。他的中文名字“宇文所安”，复姓“宇文”是取“欧文”的谐音，“所安”二字则取自《论语·为政篇》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将中国古典诗歌之美传达给西方

中国古典诗歌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但因为文化差异，它的美并不那么容易被感知。尤其对于欧美读者来说，欣赏中国古典诗歌需要一位引路人，宇文所安义不容辞地担负了这项使命。除了翻译大量唐诗外，他还编译《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和《中国文论》，并发起建立“中华经典文库”丛书项目，致力于长期、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华人文经典，让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广泛而深入的了解。该丛书将杜甫的作品作为首个项目，宇文所安耗费八年心血，将杜甫存世的1400首诗歌进行翻译，完成了六卷本的《杜甫诗集》，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杜甫的作品进行英文全译，是足以载入西方汉学界史册的事件。

诗歌之美，胜在意境。然而意境是很难把握的，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对于语言和文化都大相径庭的外国人来说理解难度很大。宇文

所安凭借其对诗歌的感悟力以及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跨越了重重障碍，向西方呈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比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是千古名篇，但语言非常朴素平实，如果直译很难展现出诗歌的动人情感和背后的丰富内涵。宇文所安领悟到这首诗的特别之处，知道如何呈现这首诗的诗意。他在《追忆》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解读，认为这首诗的妙处正在于运用“寻常”的手法和意象呈现出“异乎寻常”的记忆与心境。结合安史之乱，我们会“想到杜甫一生的流离颠沛，想到安禄山之乱和中原遭受的蹂躏，想到失去的安乐繁华”，但是杜甫没有直接叙述，而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展现深刻的痛苦。宇文所安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理解到这种程度，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来说，真的是难能可贵，因而他的翻译是有生命力和历史感的。他对中国古典诗歌富于魅力的解读和阐发，让国内外的众多读者产生了深深共鸣。

挖掘中国古典文学背后的思想底蕴

翻译只是基础，宇文所安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宇文所安认为，文化传统要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学者对于古典诗歌的研究，不仅仅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认识它，还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观察它、探讨它，让一度沉睡的古典文学得以苏醒，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活起来。为达到这一目的，宇文所安大胆探索，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来重构文学史。他反对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机械地将名家名作加以编排汇集，认为这样标准刻板的文学史叙事脱离了丰富的文学实践。在结构主义、新文化

史等理论的影响下，宇文所安一直都在思考建立新的文学史的可能。在《瓠落的文学史》中，他明确提出文学研究者要进行三个层次的自我审查：第一个层次，文学实践中司空见惯的研究方式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用朝代或者文学体裁来划分文学史的做法是否存在问题？第二个层次，能否将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象加诸我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的事物？能否用历史感和历史想象力重新激活文学，让它们呈现出更加细腻的历史纹理和脉络？第三个层次，无论是文本还是阶段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后来的历史过滤了的？尤其是唐朝和唐以前的文学史，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后代文人学者的标准和品位？他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努力，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得到实现。

除了文学史的建构问题外，宇文所安还主张“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的”，他力图突破诗歌文本研究的专业藩篱和对“文学史”范畴的经典界定，将文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相结合进行研究，挖掘文化与历史背后的思想底蕴。其名作《追忆》就体现了这种风格，该书尝试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将文学、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研究融为一体，其独特的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它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有利于激发其活力，让厚重的中国古典文学来到当下、走向世界。

让东西方古典诗歌实现对话

宇文所安虽然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看重的是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宇文所安一直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对文化

传统的真正保护，并不是要将其藏到博物馆隔离起来，而是要允许它在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中改变、转型。宇文所安文化交流互鉴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独特之处，如果能发掘出各自的闪光点，则可以彼此辉映，从而流光溢彩。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宇文所安写出了《迷楼》这部充满魅力的作品。该书突破常规，通过一些独特的线索、意象与母题，将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爱情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经典的与不知名的，古代的与当代的，这些诗歌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指涉关联，这种突破时空的处理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迷楼》一书充分显示出宇文所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渊博的文学素养，在书中，除了中文和英文诗歌之外，他还旁征博引，对于德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希腊文的诗歌资源运用自如，让东西方的文化传统真正彼此对话。“迷楼需要乐趣和惊喜。我们可以满怀乐趣地阅读中国诗和英语诗以及其他欧洲诗”。这已然突破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直抵诗歌的本质，希望读者能一视同仁地欣赏，同时也从新的角度看待每一首个别的诗。

宇文所安自称是“唐诗王国的异乡人”，然而这个异乡人对中华文化有着真挚深沉的情感，并甘心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向世界去呈现中华文化的动人气韵和浩瀚胸怀。他具有将学术和文化视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视野与抱负，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靖基（1902—1997年），江苏常州人，1916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1918年入宝兴长总号当练习生，从一名练习生到创设安达纱厂，再到创办爱国建设公司，刘靖基不仅为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工商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也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了重要功绩，是我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

立志实业救国

1919—1923年，刘靖基先后在江苏苏纶纱厂、宝丰纱厂、宝成纱厂任职。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上海滩，刘靖基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种种侵略欺辱压迫，立志实业救国。

1930年刘靖基与刘国钧合作投资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简称“大成”），在1930至1937年的时间里两人精诚合作，以敏锐的市场意识，密切关注国际纺织业以及上海外资纺织企业前沿动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创造经营奇迹。因为刘国钧与刘靖基均出生于普通家庭，所以尽可能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创造利益兼顾的劳资关系，加惠工人，并十分注重厂风建设，因此大成在当时收获了非常好的社会声誉。

1937年11日军侵占常州，大成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导致纱厂被日军炸毁，损失严重。1938年刘靖基在上海筹办安达纱厂，生产“飞虎牌”棉纱，质量上乘，远销海内外。1940年，刘靖基为中国染化工程学会成立大会特刊题词“衣被群生”，体现刘靖基体恤民生的情怀。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靖基为民营纱厂税收和棉花联合采购等问题大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受到同业拥戴，成为我国棉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

回上海迎接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刘靖基拒绝参加国民党物资疏散委员会，拒绝向国民党交纳所谓“保安捐”，并在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毅然决然冒着硝烟战火从香港回到上海迎接解放，这是刘靖基平生最大的抉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部队给刘靖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部队纪律如此严明。后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刘靖基撰文回忆：“上海刚解放，我就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不住民房，秋毫无犯，深感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从那时起刘靖基的心底开始深深信任共产党。

1949年6月，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刘靖基出席茶话会，陈毅主动询问刘靖基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解决，这时刘靖基瞬间想到曾经的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邀请他参加会议，他只不过讲了民营纱厂很困难，垮了政府要负责，吴国桢就破口大骂他放肆。对比两个政府、两个市长、两次会议，刘靖基内心感慨万千，即席对陈毅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中国大陆发展事业，从此开启他“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生新征程。

带头落实公私合营

1950年，上海遭遇国民党“二·六”轰炸，各行各业被迫停产，刘靖基想办法从国外调回20万美元帮助恢复生产。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刘靖基主动捐献8.3亿元（旧人民币），收获社会各界的一片赞誉。1951年刘靖基加入民主建国会。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新阶段，1953年10月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前召集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鼓励刘靖基说“刘先生，你回去要带带头啊！”刘靖基深受鼓舞，当即表示安达、大丰两个企业愿意早日争取公私合营。

1954年安达、大丰两个企业经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批准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对全国棉纺织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抛头马”作用。安达、大丰两个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他说：“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我们与国家不是买卖关系，我是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后来刘靖基讲述为什么愿意公私合营时说道：“首先是爱国的民族自尊心，我希望祖国强大，只要能使祖国强大的事，我就要走在前面，工厂国营了，工人是主人翁，生产率将比私营厂提高，这就好”，这其实也是刘靖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办纱厂饱受外国人欺辱、饱受国民党政府压榨而发出的肺

从旧社会『实业救国』到新中国『爱国建设』

爱国实业家刘靖基：

□ 安 培

肺腑之言，只有国家独立和富强了，才不用在夹缝中求生存，才不用受外国人欺辱，才能更好地堂堂正正地在自己祖国大地上办好企业。

争为“四化”建设作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靖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工作上来，对外联络、经济咨询、调查研究应接不暇，他却乐此不疲，作诗抒发心声：“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八十不稀奇。九十老翁干劲足，争为四化作贡献”。

在邓小平“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下，1979年9月刘靖基联合1000多位海内外工商界人士，共同集资创办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公司以“爱国建设”为宗旨，“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司采取“认款制”，认款人只按银行定期利率领取利息，不分红利，不以私人盈利为目的，并把公司经营业务所获得的利润，除依法缴纳国家税金外，全部用于继续服务“四化”建设。

公司成立后，以“拾遗补缺”为经营理念，通过投资自办、合办等形式在上海创办了百余家中小型工商企业，横跨上百个行业，形成了“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爱建”的盛况，既满足了市场需求，也满足了人民生活需求以及工业生产需求，还替国家分忧，解决了众多回沪知青以及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公司在当时创造了很多行业领域的“第一”，为上海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乃至全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

1997年2月15日，刘靖基在上海逝世，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顾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97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专门刊登《刘靖基同志生平》一文，纪念刘靖基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